

施叔青《風前塵埃》中的另類歷史想像*

劉亮雅**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摘 要

臺灣自解嚴以來歷史記憶小說蔚為風潮，其中有些小說納入了多族群、多國經驗及其與殖民主義的關係，探索刻板印象以外的族群歷史經驗，以幾乎同等篇幅呈現兩個族群以上的觀點，打破板塊式的國族想像，開啟了另類歷史想像的可能性。本文探討施叔青臺灣三部曲的第二部《風前塵埃》中的另類歷史想像，特別是臺灣文學很少處理的日治時期的「理蕃」、太魯閣之役、日治時期花蓮地區的族群關係、日本移民村、戰後的日本殖民遺緒等議題。筆者認為此書「對位式」地重新想像日治時期臺灣東部三個族群及戰後日本殖民遺緒，重新探索同化、皇民化、抵殖民乃至於土著化所涉及的身分問題，對日本殖民主義與臺灣後殖民呈現出與先前不同的複雜視野。

關鍵詞：《風前塵埃》，另類歷史想像，對位式書寫，日治時期臺灣，殖民主義，國族、性別和族群政治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解嚴以來的另類歷史想像：跨國流動中的族群與性別」（編號 NSC 99-2410-H-002-029-MY3）成果之一。感謝兩位助理許采齡、楊震緯幫忙蒐集資料，也感謝《清華學報》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yliou@ntu.edu.tw

一、前言

解嚴以來本土化與民主化帶動一連串巨變，百花齊放，眾聲喧嘩。戒嚴時期被壓抑的不同族群歷史記憶浮現。禁忌議題如二二八、白色恐怖被討論、書寫。政治家如李登輝、郝柏村、林洋港的傳記、個人回憶錄紛紛出爐，披露政治秘辛。婦權會推出不同族群阿媽的故事，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利格拉樂·阿烏的原住民部落訪談、札記也都出版。許多傳記、回憶錄，包括近年來聖嚴法師、齊邦媛的傳記，都觸及白色恐怖，乃至張典婉書寫 1949 年太平輪航向臺灣的故事，龍應台書寫 1949 年國民黨戰敗、外省人遷臺以及臺灣人當日本兵的痛苦，都觸及許多過去國民黨統治的禁忌。解嚴以來的歷史記憶小說與此呼應，從二二八、白色恐怖小說，眷村小說，原住民小說，霧社事件小說，客家小說，臺共小說，到大陸探親小說等，不一而足。也因此展現出去中心、替弱勢與邊緣發聲、多元文化、殖民遺產混雜等特色。然而，大多小說仍只呈現單一族群經驗，而未能讓不同族群觀點並置齊觀。

一反大多數歷史記憶小說以單一族群歷史經驗為主，有些小說納入了多族群、多國經驗及其與殖民主義的關係。而這與全球化理論盛行、十多年來外籍配偶增多、在臺灣構成了新移民以及後殖民及族裔論述對臺灣殖民歷史更深入細緻的研究息息相關。臺灣需要被放在跨國流動以及論述知識系統生產脈絡上看，不只是過去認為臺灣夾處於中國、日本、美國霸權之間那麼簡單。阿帕度萊 (Arjun Appadurai) 指出，全球化的時代，國家的疆界無法阻擋資金、人口、思想、貨物、影像、科技等的跨國流動。¹ 由於政治、貿易及其他因素，臺灣與世界許多地方產生移出移入的關連，尤其我們看待臨近的東南亞、韓國的方式組構了我們在亞洲的位階想像。而連帶地，當我們回溯歷史經驗，也會發現國族與文化想像內部的矛盾駁雜，無法被單一化。這些小說經常探索刻板印象以外的族群歷史經驗，以幾乎同等篇幅呈現兩個族群以上的觀點，呈現族群之間的衝突、互動、對話或影響，打破板塊式的國族想像，開啟了另類歷史想像的可能性。與此同時，性別關係又常是展現與交涉國族關係的重要渠道，國族與性別的交錯因此成了小說焦點。這些小說中，複雜的國

¹ Arjun Appadurai,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Public Culture*, 12.1 (2000), p. 5.

族關係經常透過性別權力關係加以鋪陳。例如《海神家族》(2004)² 中日治時期琉球女性移民嫁給福佬族，他們生下的混血女兒嫁給外省人，而第三代女子則很長時間不知外公在二二八中遇害，二叔公是臺共。施叔青的《風前塵埃》(2008)³ 也很特別，日治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女子愛上太魯閣族男子，日本戰敗後被迫帶女兒回到日本，但她讓這段戀情變成祕密，隱瞞女兒的身世，而她自己的母親甚至否認她在臺灣出生。

《風前塵埃》是施叔青《臺灣三部曲》的第二部，無論在美學上與思想深度上都展現了野心。如同解嚴以來許多歷史記憶小說，《風前塵埃》採取非線性敘述，彰顯後現代的去中心，而異乎解嚴前鍾肇政、李喬等線性敘述的傳統「大河小說」。然而較諸其他許多解嚴以來歷史記憶小說，《風前塵埃》更關注於涉及跨國殖民主義的大歷史以及諸多小歷史與大歷史的關係。這些重層交疊的歷史記憶卻又因跳躍、非線性的敘述而有如破片，藉此施叔青暗喻了臺灣歷史的複雜曖昧、斷裂錯亂以及重組記憶之必須。南方朔認為《風前塵埃》裡堆疊的記憶碎片彷彿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筆下的歷史天使看到的受苦者的歷史，讚賞它「有如揭謎式的多層次敘述」，⁴ 讓「征服—被征服」、「認同—自我分裂」、「受害—加害」、「迫害—野蠻」等歷史課題「被鑲嵌進了更複雜、更細緻的架構」。⁵ 施叔青採取多線進行、今昔交錯跳接，以一個日本移民家族史為主軸，從日本總督到被殖民的漢人、原住民，呈現了立體的歷史縱深以及多重視角的交響。另一方面，卻又不直寫女主角橫山月姬的心理，而是由不同的人物揣測想像她，顯現歷史的斷裂與重構的困難。人物藉照片召喚記憶，施叔青卻突顯攝影、望遠鏡等現代技術如何可能被殖民凝視(colonial gaze) 所利用。《風前塵埃》處理了臺灣文學絕少探討的幾個議題：日治時期的「理蕃」、太魯閣之役、日治時期花蓮地區的族群關係、日本移民村、戰後的日本殖民遺緒。戰後日本與臺灣兩邊政府都長期漠視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與文化。《風前塵埃》讓我們重新想像日治時期臺灣東部並檢視日本殖民遺緒。更特別的是，《風前塵埃》啟始於 2003 年主角之一、在日本長大的「灣生」第二代女子無弦琴子，她一邊與韓國女學者策畫日本帝國時期宣揚戰爭的和服，一邊看著臺灣方面的邀請函，回憶 1973 年來臺尋訪母親的記憶和自己的身世。不論是日治時期的殖民相遇，七零年代初期無弦琴子的臺灣之行，或是現今無

² 陳玉慧，《海神家族》(臺北：印刻出版，2004)。

³ 施叔青，《風前塵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08)。

⁴ 南方朔，〈推薦序：透過歷史天使悲傷之眼〉，收入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8。

⁵ 同前引，頁 10。

弦琴子的反思與想像，都涉及了跨國流動中的國族與性別，也涉及今昔的映照。

本文將參考薩依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對位式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 的觀照，探討《風前塵埃》的另類歷史想像。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裡挪用西方古典音樂對位法，提出後殖民對位式閱讀。他認為我們經常只讀帝國歷史敘述或文學，或是相反的，只讀反抗帝國的歷史敘述或文學，卻不知兩者因帝國主義而緊密聯結。例如卡繆 (Albert Camus, 1913-1960) 和紀德 (André Gide, 1869-1951) 筆下的阿爾及利亞就是法農 (Frantz Fanon, 1925-1961) 筆下爭取獨立的阿爾及利亞。⁶ 薩依德以西方古典音樂對位法中不同主題輪番出現，彼此交響，最後多音齊鳴為比喻，指出後帝國知識份子應詳細談論帝國與昔日殖民地社會之間重疊的社群，以對位的方式檢視不同經驗如何構成一組交錯重疊的歷史。⁷ 本文認為《風前塵埃》採取對位式書寫，呈現日本帝國與昔日殖民地台灣社會之間重疊的社群，而形成了另類歷史想像。我認為小說「對位式」地重新想像日治時期臺灣東部三個族群以及戰後日本殖民遺緒，重新探索同化、皇民化、抵殖民乃至於土著化⁸ 所涉及的身分問題，對日本殖民主義與臺灣後殖民提出了複雜的視野。第一部分從四個層面討論《風前塵埃》的另類歷史想像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第二部分探討它如何呈現跨國流動、殖民主義與「理蕃」的關係，包括「理蕃」涉及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關係。第三部分探討它如何呈現殖民主義與國族、性別、族群身分政治。結論則進一步討論它提供了什麼歷史視野。

二、另類歷史想像

不論對於後殖民國家或是後帝國而言，殖民記憶都涉及了跨國流動。《風前塵埃》充分彰顯日本帝國與臺灣殖民地社會之間重疊的社群。無絃琴子回憶 1973 年來臺尋根之旅，彷彿帶領了跟她一樣對日治時期臺灣陌生的讀者，啟開了被埋藏的歷史記憶。讓我們交錯在無絃琴子在臺灣的訪查、想像、回想，以及敘述者呈現的日治時期日本總督、巡查、人類學家、客家人、太魯閣族、阿美族之間。而無絃琴

⁶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p. 259。

⁷ 同前引，頁 18、51。

⁸ 同化係指 1920 年代日本殖民政府所採取的同化政策，也就是內地延長主義；皇民化係指 1937 年日本為了動員殖民地人民參加太平洋戰爭，所採取的皇民化政策。有關於同化與皇民化，請見本文第四部分的討論，尤其註 60 所引用的荊子馨對此的見解。抵殖民係指被殖民者對殖民統治的抵抗；土著化指的是殖民者或移民的臺灣化，請見本文第三部分與結論對此的討論。

子參與的美國一所大學的博物館舉辦的戰爭和服展，則更突顯戰爭記憶，並將臺灣放在日本帝國與不同殖民地之間相互的複雜關係裡。

在幾個層面上，《風前塵埃》的另類歷史想像具有特殊意義。首先，它透過當代的視野，回到日治時期，對於戰後接受國民黨教育的世代，猶如去重建一個被刻意遺忘的世界，尤其它以日治時期的「理蕃」與太魯閣之役為其中一個焦點，並放在日本帝國與全球跨國殖民主義的脈絡，以及它呈現當代韓國與臺灣對日本殖民遺產的不同態度，都深具全球化下的跨國視野。其次，《風前塵埃》交替今昔，刻意選擇一個在日本長大的灣生第二代女子追溯家族在臺灣的生命歷程，這樣的視角本身也很另類，因臺灣很少討論臺灣生的日本人或臺日混血。⁹ 由於對日治時期的陌生，許多人不知道當時日本政府在臺灣設立移民村。臺灣很少探討戰後日本如何看待日治時期臺灣，而戰後日本也忽視日治時期臺灣。第三，《風前塵埃》回到日治時期不同族群與日本統治者的關係，重新探討同化、皇民化、抵殖民、土著化所涉及的身分問題，而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通常只呈現被統治的臺灣人或日本統治者的心理。¹⁰ 《風前塵埃》採取此種薩依德稱為對位式的呈現，探討帝國與昔日殖民地社會之間重疊的社群，呈現他們在衝突與互動中也彼此影響，而這點延續了臺灣三部曲的第一部《行過洛津》裡讓統治階級與被統治者的意識並陳。¹¹ 第四，《風前塵埃》選擇了日治時期後山花蓮為主要背景，當時人口結構以原住民為主，漢人、日本人為其次，而他們又有不同的歷史經驗，在臺灣文學裡這也鮮少被處理。尤其花蓮是日本化的城市，漢人文化則是相對弱勢。

《風前塵埃》一開始就描寫西元 2000 年以後，住在東京的無絃琴子家裡突然來了三位臺灣花蓮原住民訪客，他們代表花蓮縣政府，邀請琴子的母親橫山月姬回花蓮參加一座日本佛寺修復的開光典禮，並希望訪談橫山月姬，翻拍琴子的外公橫山新藏擔任咚比冬駐在所巡查所拍的舊照片，以留下日本警察的影像紀錄。三位原住民，一位是已歸化日本的阿美族女子，一位是對日本人感恩的太魯閣族退休警察，一位是太魯閣族文史工作者。然而橫山月姬已亡故，而琴子對家族歷史瞭解不多。這一景耐人尋味，因它顯現許多原住民緬懷日本殖民統治，相反於戒嚴時期國

⁹ 琴子應是臺日混血，但小說中她認為生父始終是謎。

¹⁰ 例如，西川滿等日治時期長住臺灣的日本作家之文學，它們也是臺灣文學的一部分。請參看 Faye Yuan Kleeman, *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p. 69-86. 西川滿筆下也有臺灣人，但大多是從日本人觀點所見的臺灣人。

¹¹ 施叔青，《行過洛津》（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03）。

民黨政府灌輸的反日教育。同時，日本佛寺的修復涉及了在李登輝執政後，延續到陳水扁當政，臺灣重新面對日本殖民記憶，並邀請昔日殖民者一起參與。然而這些原住民對日本統治的懷念又與《風前塵埃》中描寫的原住民反日的悲壯形成對比。另一方面，在日本長大的琴子雖然曾是 1968 年東京學生運動的激進分子，卻不知自己的身世，此一空白暗喻了戰後日本抹去了帝國和戰爭的記憶。而同時，她回憶七零年代臺日斷交後第二年的臺灣行，不論是同團的日本移民村老人對臺灣的鄉愁，或是花蓮人對日治時期的眷戀，卻都顯示存在於臺灣與日本民間無法抹滅的殖民記憶。

戰後臺灣與日本兩邊政府，由於各自所遭逢的特殊政經條件，長期無法檢視日本殖民遺產，刻意遺忘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風前塵埃》聚焦於日治時期的臺灣，以及歷經意識形態操弄的遺忘之後的重新建構。戒嚴時期的中國中心文化政策與思想教育，刻意抹煞日本殖民的影響。然而在反日或「去日本化」的政策底下，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曖昧，在諸如公賣制等方面延續了日治時期的體制，更不消說在經濟上繼續與日本密切合作。《風前塵埃》一方面重新想像日治時期臺灣東部從抗日到親日的複雜面貌，另一方面，它對於 1973 年琴子花蓮之旅的描寫則顯示戒嚴時期臺灣民間的殖民記憶與文化遺產。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與被美軍佔領，日本在迅速的情勢變遷之下無法面對去殖民化的議題。¹² 戰敗後日本向盟軍投降，帝國迅即瓦解，且自身成了被佔領的國家，隨著日本殖民地的消失，其殖民意識也受到壓抑，乃至於去殖民化從未成為其國內的議題，反而強化單一排他性的國家認同，否定帝國與戰爭記憶。¹³ 過去帝國的皇民在戰後不再被視為日本人，從臺灣返歸的日本僑民也被歧視，在臺灣生的日本僑民則遭到更多歧視。如同琴子所說，「『灣生』這個詞彙帶著微微的憐憫和輕蔑」。¹⁴ 而在殖民地屬於日本統治階級的月姬，則因為與臺灣原住民哈鹿克相戀生女，更不見容於戰後強調單一排外的日本。母親綾子不但否認月姬是「灣生」，甚至說她是被領養的棄兒。月姬也因此自我否定，無法告訴女兒她的身

¹² 去殖民化是指解除殖民所造成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不平等。去殖民化與抵殖民都來自英文 decolonization，本文採兩種翻譯是為了區別帝國與（前）殖民地雙方不同的位置。

¹³ 荊子馨的原作以英文發表。Leo T. S. Ching,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但考慮到中譯本對臺灣讀者可能更方便，本文採用中譯本。見荊子馨著，鄭立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6），頁 58-63。

¹⁴ 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128。

世。琴子則內化了歧視，自覺不是「純粹」、「完整的日本人」，¹⁵ 害怕被人瞧不起，因此刻意學標準的東京腔，想要忘掉「自己是第二代的『灣生』，而且生父不詳」。¹⁶ 琴子為了幫助失智症的母親而隻身來臺尋找母親舊時記憶時，「沒有回家的感覺」，¹⁷ 聽到臺灣人用帶著腔調的日語與她攀談，便以一口純正東京腔刻意與他們「劃清界限」。¹⁸ 這些在在顯現日本否定帝國與戰爭記憶所造成的歷史記憶的斷裂以及前殖民地人民與「灣生」所受到的歧視。

就《風前塵埃》中花蓮書寫之於臺灣文學的意義，它除了延續王禎和（1940-1990）、楊牧、陳黎、林宜滄等人的花蓮書寫，更呼應了舞鶴早在與楊照對談時提到的非西部書寫的重要性。舞鶴認為，臺灣年輕寫作者處理本土題材時流於膚淺，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對臺灣的了解都侷限在西海岸，特別是西海岸的幾個大都市」，¹⁹ 缺乏對臺灣其他地區，尤其原住民歷史文化的深度瞭解。由於中央山脈的阻隔，東部對於漢人移民而言乃是二次移民的所在。書中描寫新竹芎林客家女子范姜平妹乃是因日本軍隊接收臺灣時，父親被殺，家園被毀，她跟隨遠親逃離，遷居花蓮鳳林，當時的後山是「獵人頭的蕃人盤據之地，風土病肆虐……清朝的封山禁令使漢人裹足不前」，²⁰ 因此漢人之中只有殺人犯、躲債或落魄失意的人才來到這裡。然而，連原住民太魯閣族也是自西部移居的。書中日本人類學家說：太魯閣族乃是東賽德克族，因人口增加、獵區不足、找尋食鹽，而從南投翻越中央山脈移居東部。而透過平妹對購買「蕃仔田」的熱衷，敘述者告訴我們，移居後山的漢人增多後，不斷地與原住民爭地耕種，甚至開雜貨店與原住民以物易物，進而騙取原住民的土地。

不論就有關臺灣歷史、花蓮地區族群歷史、日本帝國史的文學而言，《風前塵埃》都填補了重要的空白與遺漏。而它對位式地呈現日本統治者與原住民、漢人的關係，將臺灣放在全球殖民主義跨國脈絡，並描寫戰後臺灣、日本、韓國對殖民遺緒的複雜態度，此一新穎的框架一方面讓弱勢與強勢族群對同化、皇民化、抵殖民、土著化的觀點並置對照，以便與日本殖民主義重新協商，一方面從全球化跨國

¹⁵ 同前引，頁 90。

¹⁶ 同前引。

¹⁷ 同前引。

¹⁸ 同前引。

¹⁹ 王麗華，〈文學的追求與超越——舞鶴、楊照對談錄〉，《文學臺灣》，8（高雄：1993），頁 128。

²⁰ 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95。

流動的角度看臺灣，探討什麼才構成臺灣的後殖民，堪稱提供了另類的歷史想像。

三、跨國流動、殖民主義與「理蕃」

日本殖民政府「理蕃」與太魯閣之役²¹ 及其後續影響是《風前塵埃》的一個主要重點。過去有許多小說書寫霧社事件，太魯閣之役則可能是首次被處理，也顯現施叔青的企圖心。施叔青將「理蕃」放在小說開始不久，以太魯閣之役為主要實例。對日本人而言，「蕃」乃是尚未文明化的臺灣原住民，也就是仍保有其社會與文化自主性的原住民。在日本統治之前，平埔族曾被荷蘭人、西班牙人或漢人統治，多重殖民之下文化受到破壞，或被納入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然而住在高山或蘭嶼的原住民卻因為其與世隔絕的地理優勢，仍維持各自自治與自主狀態。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於 1910 年開始的五年「理蕃」計畫則帶來劇變。²² 太魯閣之役是「理蕃」之中的一場戰爭，霧社事件則是「理蕃」後續引發的反抗。

《風前塵埃》將日本對臺灣原住民族施加的「理蕃」放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全球殖民主義跨國流動的脈絡來看，並與日本設立移民村的殖民計畫有關。因此這一部分我將討論書中如何呈現跨國流動、殖民主義與「理蕃」的關係，包括施叔青如何以對位式手法呈現「理蕃」所涉及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關係。施叔青的對位式歷史書寫讓我們看到「理蕃」雙方不同經驗的交錯重疊。

但我先要借用薩依德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區分：帝國主義指的是「宰制的宗主國中心 (metropolitan center) 統治遙遠領土的作法、理論與態度」，²³ 殖民主義則「幾乎總是帝國主義的結果，是指在遙遠領土上移植墾殖地 (implant settlements)」。²⁴ 帝國主義擴張必然帶來軍事、經濟侵略，殖民主義則讓語言與政

²¹ 自 1896 年開始，日本就一再動用軍力和新式武器對付太魯閣族，其中由佐久間左馬太 (1844-1915) 在 1914 年 6 月親征的太魯閣之役，是最大規模也是最後一次，歷時 74 天，讓寡不敵眾的太魯閣族幾乎滅絕。見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臺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頁 47、266；〈太魯閣事件——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citing.hohayan.net.tw/citing_content.asp?id=3018），2013 年 4 月 16 日下載。

²² 藤井志津枝指出，佐久間總督的「理蕃」計畫先後有兩次。第一次是從 1907 年開始，以「甘諾」政策為手段，軟硬兼施、威脅利誘地企圖侵占原住民的土地財產，但沒有成功。第二次是從 1910 年開始，以軍警圍剿的五年「理蕃」計畫，則獲得成功。因此一般稱後者為佐久間總督的五年「理蕃」計畫。見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頁 228。

²³ 同前引，頁 9。

²⁴ 同前引。

治、文化、經濟等制度被統治者內化；兩者都帶來跨國流動。在此全球脈絡下，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具有特殊性，因為日本也曾被視為落後、需要現代化的國家。十九世紀後半，日本脫亞入歐，將自身改造成亞洲當中的西方，僥倖地由被侵略轉而成為侵略者，在當時所有殖民主義當中，日本既是後來者，也是唯一一個非西方殖民者。做為一個曾經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形式的現代性的威脅，日本在 1868 年開始吸收這些現代性計畫，再轉而施加於鄰近國家。²⁵ 不同於西方列強，日本的兩個主要殖民地臺灣與韓國都是近鄰。1895 年日本占據臺灣，1900 年成為朝鮮的保護國，1905 年正式兼併朝鮮。

臺灣成為日本南進政策的基地，也是其現代性計畫的實驗地。《風前塵埃》裡，佐久間總督正是生逢「日本受制西方列強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內遭封建的地方軍閥割據分裂」。²⁶ 明治天皇眼見歐洲列強瓜分中國，俄國修建西伯利亞鐵路節節進逼，「危機意識使天皇進行維新改革，對內統一，富國強兵，對外爭取平等獨立，建設文明開化、近代化的民族國家」。²⁷ 做為效命天皇的子民，佐久間總督回顧日本在日俄戰爭中以小國獲勝，加上現代化的成功，便一掃先前的自卑，敢於與西方列強分庭抗禮，「接下來以朝鮮獨立、東洋和平為名發動甲午戰爭，清國割讓臺灣，朝鮮納貢稱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從此稱霸東洋」。²⁸

《風前塵埃》描寫日本仿效西方，由原先的被殖民而成為殖民者，而現代化的成功則成為其帝國主義擴張的口實。挾著贏得日俄戰爭後的氣勢，佐久間總督興建總督府，以便永續殖民統治。深受明治時代思想家福澤諭吉 (1835-1901) 「文明開化」思想影響，他立誓「拯救馴化」臺灣山上的「野蠻人」。²⁹ 但敘述者暗諷，「文明」與「野蠻」的二分成了日本施加現代性計畫的託辭，以現代性進步之名對原住民進行侵略掠奪宰制。因為早在 1874 年日本就以琉球船員被現今屏東的排灣族所殺的「牡丹社事件」為藉口出兵臺灣，而當時佐久間左馬太就參加了攻打臺灣的遠征軍。藤井志津枝指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對臺灣懷有領土野心，乃是因覬覦「殖產」（亦即農林資源）。³⁰ 由於臺灣的農林資源大半是原住民族居住的山

²⁵ Bruce Cumings,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3.

²⁶ 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51。佐久間是任期最長的總督，從 1906 年到 1915 年。

²⁷ 同前引。

²⁸ 同前引。

²⁹ 同前引，頁 33。

³⁰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頁 1、6。

林，在「牡丹社事件」後，日本的西鄉從道（1843-1902，西鄉隆盛之弟）就藉此出兵，並同時在北京談判，企圖「達成割讓臺灣東部『生蕃地』而失敗」，³¹ 終於在馬關條約達到佔有臺灣領土的目的。日本軍隊竟能於清領時期跨國進兵臺灣，一方面顯示滿清對臺灣的忽視，另一方面突顯當時東部仍不屬於清朝勢力範圍，而是原住民自治狀態。³²

透過敘述者對「理蕃」政策及發動太魯閣戰役的動機和戰況之描寫，小說進一步瓦解了「文明」與「野蠻」的二分，暗示「文明」當中包藏著「野蠻」。敘述者指出，總督府早先對原住民採取懷柔和隔離政策，以通電的鐵絲網作為隘勇線限制他們的活動範圍。然而佐久間總督為了讓日本財團開發山中資源，牟取伐木、採礦、煉製樟腦、種茶的利益，訂下五年「理蕃」政策，以武力鎮壓原住民。自日本領臺後，立霧溪上的太魯閣族在總頭目哈鹿克·那威帶領下頑抗十八年，當東部許多原住民族都已投降後，依然頑抗不服。佐久間總督於是親征立霧山，七十四天的戰役以絕對優勢的軍力對太魯閣族進行滅族式地屠殺。參戰的橫山新藏認為日本人是為了立霧溪的金子而來，因為在日本人之前，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都曾前來淘金，而日本領臺後便設了金砂署，負責探勘採金。

太魯閣戰役被轉化為總督臥病期間意識流活動中零碎的記憶，藉此敘述者暗示不能以戰爭的結果簡單地論斷輸贏。總督雖然殘暴地征服太魯閣族，卻墜落山崖負傷歸來，在輾轉病榻間，他聽見白蟻啃食官邸，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打贏太魯閣族。更反諷的是，原先立誓「拯救馴化」臺灣山上的「野蠻人」的他轉而佩服太魯閣族不屈的驕傲，並發現自己內在的野蠻；他對「野蠻人」的輕蔑轉變為對其武德的欽佩以及對自己殺戮的罪疚。出身下級武士家庭的他效命天皇，歷經明治維新現代化過程，但他想起太魯閣蕃面對日軍毫不畏懼，不願被俘虜的甚至集體在樹上上吊自殺，悲壯的意氣類似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恍惚中他想起能劇「敦盛」中死去的武將，感到武將的鬼靈與死在他手下的太魯閣族亡魂怨靈混在一起，走來向他索命。他一向逼迫自己出人頭地，但年老的他此時感到無常，一切的勝利有如「風前之塵埃」。³³ 同樣反諷的是，紀念他征討有功的佐久間神社也在二戰結束那年在大颱風中被暴雨沖走，「注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敗亡」。³⁴

³¹ 同前引，頁 1。

³² 在此日軍侵臺事件後，清朝才設立「撫墾局」，安撫「生蕃」，促使其漢化，但成功的例子似乎很少，也沒有後山的例子。同前引，頁 30。

³³ 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52。

³⁴ 同前引，頁 56。

而對於太魯閣族而言，透過哈鹿克·巴彥充當嚮導，帶橫山新藏在內三位駐在所日本警察上山打獵時的意識活動，一方面回顧了部落在太魯閣戰役後失去土地、獵場、文化傳統的創傷，另一方面透露他們以盜獵和擔任嚮導暗中抵抗，延續打獵習俗。帶日警打獵已不復族人打獵文化的精神，因為既無祭典，又因日本人伐木、開林道破壞了打獵需要的安靜。擔任嚮導觸動了哈鹿克童年對戰敗後流離失所的痛苦回憶：祭師失蹤暗喻了文化精神傳統的喪失。哈鹿克明知他與月姬的戀情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成為橫山新藏的獵物，卻仍擔任其打獵的嚮導。哈鹿克坐在斷崖礁岩上，隔著立霧溪遠眺科羅戰場，回想當年總頭目死守這最後的堡壘，橫山新藏則用望遠鏡偷看他側臉的線條「剛毅有如刀刻」。³⁵ 獵人與獵物之間的鬥法不僅步步驚魂，且成了太魯閣戰役後日本統治者與暗中抵抗的太魯閣族人關係的最佳暗喻。

死去的原住民戰士不只是纏繞佐久間總督，也纏繞其他人。這些冤魂訴說著被幾乎消滅的族群的歷史記憶；他們也成了歷史冤魂，要求被認可、被記憶。哈鹿克被月姬藏在吉野移民村裡的日本佛寺地下室，就在提心吊膽、擔心隨時會被橫山新藏發現之際，死於日軍槍砲下的阿美族戰士的幽魂不可思議地紛紛出現在他的夢魘中，手揮蕃刀從亂石中飛奔而出，與佐久間總督討伐他的族人的惡夢，以及他自己被橫山新藏一槍斃命的惡夢重疊。敘述者指出，吉野移民村的所在地原屬於阿美族人的七腳川社，後來在一次暴動中被驅逐。³⁶ 而一位具靈異能力的日本苦行僧願空和尚前來移民村誦經，也曾在中元盂蘭後看到七腳川社阿美族人的鬼魂。經他明查暗訪，才知七腳川社阿美族人在日治初期曾「在總督府的『以蕃制蕃』的政策下，幫助日人攻打太魯閣族群，充當隘勇防止太魯閣族人出界」。³⁷ 後來部分隘勇不滿日本警察扣留薪資，全社反日，卻得不到同族其他社的響應，總督又採「以蕃制蕃」策略，令同族其他社奪取他們糧食牲畜，燒燬家屋，再強迫七腳川社的族人遷村。

雖然語言和文化彼此不通的原住民族群間常成功地聯合抗日，但太魯閣族和七腳川社阿美族抗日失敗的歷史顯示總督府擅用以蕃制蕃，對原住民各個擊破。然而同時，日本殖民者的「理蕃」也有其細膩之處，例如設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運動會，讓原住民展現尊嚴，月姬最初就是看到哈鹿克在運動會上飛奔如雲豹，深受吸引。日本人類學家的角色更為特殊。一方面他們與帝國合作，另一方面伊能嘉矩、鳥居龍

³⁵ 同前引，頁 142。

³⁶ 同前引，頁 213。

³⁷ 同前引，頁 217。

藏等人類學家的踏查與研究奠定了對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基礎，例如伊能嘉矩乃是最早對臺灣原住民做了全面性普查的學者，提出原創性的觀察，指出原住民是南島民族。《風前塵埃》裡，佐久間總督派去調查太魯閣族的人類學家則已「蕃化」，在報告中說：「有史以來，他們（筆者按：即太魯閣族）都沒有臣服於任何外界的政權，他們內心裡深信自己是完全獨立自主的人」，³⁸ 並力勸總督以和平方式「理蕃」。

七腳川社阿美族族人迫遷後留下的土地成為吉野移民村的所在地。對原住民鎮壓、迫遷與殖民計畫兩者環環相扣。不論是透過企業招募，或是後來由政府官營，農業移民其實是殖民，為日本帝國擴張、準備南進政策的重要一環。尤其官營移民，政治目的高於經濟目的，透過由政府規劃、遴選模範移民，並設立純日本集居式移民村，具有同化殖民地人民、強化對殖民地的控制的意味。³⁹ 緣於西部多已被漢人墾殖，東部則大多仍為原住民土地，東部成了移民村的重要據點。《風前塵埃》裡移民都已變賣在日本的家業，選擇以臺灣為新家鄉。移民村指導員明白表示：「內地農民在這土地生活，日本才真正領有臺灣」。⁴⁰ 范姜義明單戀月姬，一廂情願地認定她住在移民村，經常站在橋頭高舉柯達小型鏡箱相機透過鏡頭偷窺，多少顯示他對「與本地人刻意隔離，自成另一個世界」⁴¹ 的移民村之嚮往。殖民計畫還包括總督府在「日化東部」的政策下，將花蓮複製為日本城市，在阿美族人的聖山美侖山山麓建了大神社。橫山新藏曾跟月姬說花蓮很像大阪。七腳川的倖存者笛布斯就被移民村的現代化所吸引，在移民村的小學當工友，取了日本名字，後來成為阿美族第一位師範畢業生、日本神社的神主。直到他被邪靈糾纏，求助女巫師幫他找回靈魂，才回復阿美族名字和裝扮。

總結來說，《風前塵埃》的對位式書寫透過對佐久間總督的描寫，將「理蕃」放在全球帝國擴張與殖民主義脈絡，嘲諷征服者的「文明」裡包藏「野蠻」，並改寫日本歷史上佐久間總督的形象，呈現其殘暴征服後的自我懷疑、罪惡感及對原住

³⁸ 同前引，頁 26。

³⁹ 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臺北：國史館，2001）。《風前塵埃》裡只有官營移民，但根據張素玢的研究，有官營也有私營。張素玢指出，日本在臺灣的移民事業可分為四期：「第一期為初期私營移民時期，從領臺之後到明治四十一年（1908）。第二期為花蓮港廳官營移民時期，從明治四十二年（1909）到大正六年（1917）。第三期為臺東廳私營移民時期，從大正六年總督府頒布移住獎勵要領，到昭和二十年（1945）。第四期為後期官營移民時期，從昭和七年（1932）到昭和二十年。」同前引，頁 10。

⁴⁰ 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13。

⁴¹ 同前引，頁 156。

民誓死抗暴的欽佩。透過對哈鹿克的描寫，則呈現原住民在此「現代性」計畫中所遭到的社會與文化破壞及創傷，然而原住民的反抗仍持續不斷。透過對「蕃化」人類學家的描寫，則肯定日本人類學家協商於「文明」與「野蠻」之間的研究貢獻，並進一步顯示少數日本人的「土著化」。而范姜義明與笛布斯則都被日本移民村吸引，被日本同化，但笛布斯後來找回了文化主體性。

四、殖民主義與國族、性別、族群身分政治

《風前塵埃》的對位式書寫不僅止於呈現日本帝國擴張與原住民的反抗，更在於顯現日本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更多文化上的重疊與交錯，包括同化、皇民化政策所造成了身分問題及抵殖民的身分政治。施叔青顯示殖民主義不只試圖讓被殖民者同化，也讓殖民者某種程度土著化，書中著墨最多的跨種族婚戀尤其突顯此一雙向性。然而由於社會位階的差異，跨種族婚戀涉及了複雜的國族、性別、族群身分政治，暴露了同化的內在矛盾以及土著化被打壓或禁制。

日治時期漢人與原住民的情況並不相同。就山地原住民而言，「理蕃」讓他們由原本獨立自主轉而被納入日本帝國，且被排擠到社會階層最下級。就漢人與平埔族而言，他們則由原本隸屬於清朝轉而隸屬日本，位階上次於日本人。日本統治有步驟且有其細膩之處。殖民之初，採取漸進主義和分離主義的政策，1920年代改採同化政策（也就是內地延長主義）；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後來擴大為太平洋戰爭，為了動員殖民地人民，再改採皇民化政策。殖民主義帶來跨國人口、文化、資金、思想的流動，不但塑造了國族身分，且帶來了現代國家、司法、教育、文化、醫療、經濟體制。臺灣在清朝統治最後十年才開始現代化，日本則以現代化的優勢，讓臺灣人民接受其統治，或是一邊接受一邊反抗。以下我以橫山新藏與原住民妻子、月姬與哈鹿克、范姜義明與月姬的關係為主，探討《風前塵埃》如何對位式地呈現性別關係與國族關係交纏，顯現殖民地社會所生產的種族化社會層級以及複雜的國族、性別、族群身分政治。

《風前塵埃》裡日本殖民者對於跨種族婚戀採雙重態度，突顯種族宰制與性別宰制的纏繞。橫山新藏將他與太魯閣族頭目女兒的婚姻視為征服——「把日本人優越的血液注入未開化的野蠻人」，⁴² 卻認為月姬與哈鹿克的愛情代表了日本被征

⁴² 同前引，頁121。

服，「有辱門風國族」而深惡痛絕，⁴³ 後來他殺了哈鹿克。這顯示對他而言，殖民關係被父權價值穿透，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互相爭奪對方的女人以證明自己的勝利，但女人淪為被男人交換的他者。橫山新藏一方面歧視原住民，另一方面將女人物化、客體化、私有財產化，禁制或規訓女人的情慾。綾子也內化了日本殖民主義的父權價值，對於月姬翻轉此一價值深以為恥。戰後綾子說月姬是領養的棄兒，月姬不敢提琴子的身世，講得版本不一，時間無法吻合，甚至需要假借同學真子的故事講述自己與臺灣原住民相戀的故事，這種自我否定與自我分裂更突顯月姬遭受的性別壓迫與「灣生」受到的歧視。戰後日本歧視「灣生」乃因認為「灣生」在文化或血緣上已臺灣化，月姬愛上臺灣原住民恰恰被視為土著化而被禁制。月姬告訴琴子：「其實臺灣就是我的故鄉，可是很奇怪，心裡又想否定它，出生在殖民地，好像就比較卑下委屈，好像如果我的故鄉是日本，就不會感到自卑」。⁴⁴

透過無絃琴子的重新建構，《風前塵埃》一方面呈現殖民者如何合理化此一雙重的性標準，以及女性對此的態度，另一方面在一些關鍵處又發現歷史的斷裂、重構的困難。根據月姬所述以及她蒐集到的蛛絲馬跡資料，無絃琴子重建家族故事，有時不只一個版本。橫山新藏被殖民地臺灣警察工作條件吸引，由原本在名古屋的和服綢緞店當夥計，轉任花蓮吉野移民村派出所；總督親征太魯閣社時被編入征戰隊伍，太魯閣戰役後升格為立霧山冬比咚駐在所巡查部長。妻子綾子卻不適應，恐懼臺灣原住民，因神經衰弱而被他送回日本靜養。他隨即以響應總督府的同化政策為由，娶了太魯閣族頭目之女，但實則早已與其有染。琴子因此懷疑外公是怕私情被妻子發現才將她送回日本。但月姬卻說：「當時不少警察把家眷留在日本，隻身到山地娶頭目或長老的女兒為妻，也沒有和原配離婚」，⁴⁵ 月姬並強調橫山新藏很受蕃民愛戴。琴子來臺尋根，卻突然想到另一可能：或許綾子並不想離開，所謂「神經衰弱」只是橫山新藏為了擺脫她的一面之詞？三種版本對綾子返日的解釋不一，然而都顯示橫山新藏的私情有殖民地的同化政策當靠山。日本帝國默許官員在日本和臺灣分別擁有婚姻、家庭，藉由通婚達到統治的目的，也默許他們對原住民女子始亂終棄。而琴子的女性意識則讓她察覺綾子做為日本元配的權益被犧牲。另一方面，月姬也複製了父母對太魯閣族繼母的歧視，嘲諷她穿和服踩日本木屐的笨拙，⁴⁶ 且無法分辨她的容貌，因此頭目之女在書中始終無聲。⁴⁷

⁴³ 同前引，頁 153。

⁴⁴ 同前引，頁 128。

⁴⁵ 同前引，頁 122。

⁴⁶ 這或許來自於綾子，但某方面也顯示巴巴 (Homi K. Bhabha) 所說的「殖民擬仿」(colonial

跨種族婚戀是殖民主義下極其含混交織的所在，同化與土著化的可能性都存在，然而以當時日本文化的優勢地位，同化的力量遠遠超過土著化。但顯然，橫山新藏與太魯閣頭目之女通婚被視為政治婚姻、同化，而月姬與哈鹿克的愛情則被視為土著化，翻轉了「文明」之於「野蠻」的優越性，是日本殖民主義父權體制所無法想像、引以為恥的。即使是歷經六零年代東京學運、受到女性主義洗禮的琴子，對這段關係的重新想像也蘊含了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難以擺脫殖民凝視。琴子認為，月姬是以日本做為現代主體為出發，將「野蠻」、「落後」的原住民視為慾望客體，因此對之獵奇，投射異國情調的幻想。雖然月姬總是說真子愛上了哈鹿克，被其體味吸引，琴子卻認為在當時日本女子與原住民之間有著「無法跨越的隔閡」，⁴⁸ 因此那不是愛情。她想像當時哈鹿克已日本化，慶幸自己臉上沒有「被日本統治者視為野蠻」⁴⁹ 的黥面，學會了日語和文明的舉止，在面對美麗的月姬時感到「自慚形穢」。⁵⁰ 琴子猜測月姬以身相許乃是「執迷於異鄉情調，顛倒了美與醜、原始與開化的觀念……在獵奇心態的驅使之下」。⁵¹ 並認為月姬是受到當時流行的唯美派文學，尤其谷崎潤一郎 (1886-1965) 感官小說的影響。又猜想另一可能是正值霧社事件後不久，月姬「為日本統治者的殘酷道歉……把自己作為一種贖罪補償」，⁵² 但即使是贖罪，她做為強勢的殖民者女性乃是主動獻身，「在她與哈鹿克的肉體間採取主導權」。⁵³ 這點暗示，連贖罪獻身也帶有異國情調：殖民者女性終於可以顛覆其原生社會的男女權力關係，藉著贖罪獻身主導肉體關係。直到來到立霧山，琴子才推翻這些猜測，感到或許大自然喚醒了月姬的感官，使她愛上「在山野成長的哈鹿克，這個和天地精神相往來，聽得懂土地與自然語言的人」。⁵⁴

然而第十四章〈沒有箭矢的弓〉裡，琴子對於月姬與哈鹿克情慾關係的想像再度回到了獵奇和異國情調。⁵⁵ 被月姬藏身於吉野布教所地窖的哈鹿克，成了月姬

mimicry) 所帶來的威脅性。見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⁴⁷ 敘述者從未進入頭目之女的內心活動，顯示原住民女性被邊緣化。但後面呈現的阿美族女子娃郁的故事，則顯現原住民女性並未完全被排除在本書的對位式書寫之外。

⁴⁸ 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188。

⁴⁹ 同前引，頁 184。

⁵⁰ 同前引，頁 186。

⁵¹ 同前引，頁 188。

⁵² 同前引。

⁵³ 同前引，頁 189。

⁵⁴ 同前引。

⁵⁵ 小說中有時難以區分不知名的全知敘述者的描述與琴子想像的部分。但琴子想像的部分通常會插

的地下情人，隨時可能被發現、引來殺身之禍。在此完全受制的情況下，琴子想像哈鹿克不但「聽任他的莉慕依的支配」，且月姬在激烈的性愛過程中「好像要把哈鹿克的靈魂揪出他的身體，把他太魯閣族人的魂魄吸入她的唇間，吞噬他，使他變成她的一部分」。⁵⁶ 此一狂野如吸血鬼的想像再度將太魯閣族男人視為日本女人的慾望客體，獵奇式地強調吸納、掌控他者，滿足其吞噬太魯閣族男人的異國情調幻想。但這果真是月姬與哈鹿克情慾關係的真相？還是反映出琴子認同日本現代性，視臺灣原住民為他者，故而她的想像必然帶有異國情調幻想？真相早已因月姬屈從於戰後日本的主流論述而被掩埋了？

面對月姬與哈鹿克情慾關係的諸多可能版本，琴子發現歷史重建的困難。⁵⁷ 而這也是《風前塵埃》拋給讀者的難題：我們從未直接進入月姬的意識，而是透過其他人對她言行的記憶與想像，因此月姬以及她與哈鹿克的關係始終是謎。倒是哈鹿克，有時候敘述者呈現他的意識，有時則是透過琴子的想像（例如第十四章〈沒有箭矢的弓〉最後部分跳回到哈鹿克的意識，銜接頁 154-155）。哈鹿克的意識應當比較可靠，但他從未深入他與月姬關係的細節。就哈鹿克而言，不論是在他自己的意識或橫山新藏等日本警察眼中的哈鹿克，都不是接受日本統治的人。琴子想像中以黥面為恥，以學會日語和文明舉止為豪的哈鹿克究竟是他，還是不是他？如果是他，他也陷入自我分裂。

范姜義明則顯現當日本文化成為優勢文化後，臺灣人的自我分裂。他赴日學習攝影，回臺開設的寫真館名為「二我」，即有此意涵，讓人想起美國黑人學者杜博伊 (W. E. B. Dubois, 1868-1963) 提出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 以及加勒比海黑人知識份子法農提出的「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杜博伊在〈屬於我們的精神奮鬥〉(Of Our Spiritual Strivings) 一文中寫道，雙重意識是「這種永遠從他者的眼睛注視自己的感覺，這種以懷著恥笑與憐憫旁觀的世界的卷尺丈量自己靈魂的感覺。人總是感到他的雙重性：是美國人，又是黑人；兩個靈魂，兩種思想，兩種無法妥協的奮鬥；在一個黑人身軀裡兩種交戰的理想」。⁵⁸

入琴子回想的事件，例如與母親的對話。

⁵⁶ 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207。

⁵⁷ 琴子來到花蓮，望著太魯閣族人的聖山，「拼湊母親月姬時空斷裂、支離破碎的過去。她知道很難整理出一個完整的輪廓。」同前引，頁 124；琴子來到昔日外祖父母來過，現在改名為文山的露天溫泉，她想著家族歷史的破碎，「不知道她所挖掘出來的是停留在哪一個階段」。同前引，頁 178。

⁵⁸ W. E. B. Du Bois, "Of Our Spiritual Strivings,"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Terri Hume Oliver (ed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p. 11. Du Bois 的文集 *The Souls of Black*

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一書中分析當白人殖民者的文化形成優勢文化，其所帶來的社會壓力讓被殖民的黑人自我分裂，對自身的黑皮膚產生負面聯想，於是認同白人殖民者的語言與文化，也就是「戴上白面具」。⁵⁹ 范姜義明進中學時，正值同化政策開始實施；早在養母在世時，范姜義明家已是國語家庭。⁶⁰ 屬於地主階級的他留學日本，熱愛日本文化，自認對日本文化的涵養高出於一般日本人，返臺後並對日本的一切「生起強烈鄉愁」。⁶¹ 他的精神內在完全日本化，愛慕日本女子，若不用平假名則不知如何寫情書，並想要蓋一幢純日本風的別墅獻給愛人，卻在與日本政府間諜馬耀谷木談及他愛慕灣生的日本女子時，受到羞辱。馬耀谷木認為他只想藉由與日本女子婚配，入籍日本，「成為名符但不實的日本人」。⁶²

馬耀谷木的羞辱顯現了同化的內在矛盾：一方面要讓殖民地人民成為日本人，另一方面又強調日本人在種族和文化上比殖民地人民優越，後者難以成為日本人。這讓范姜義明想起在日本留學時單戀一位小酒館女侍，日本朋友要他假稱是九州人，比較有勝算。那時他還以為自己的日語不夠純正，卻不知這是同化政策下的差別待遇。然而敘述者同時嘲諷范姜義明對月姬的單戀乃是一種自戀式地投射，寫日文情

Folk 最早於 1903 年出版。

⁵⁹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67), pp. 17-18. 本書最早以法文於 1952 年由巴黎的 Editions du Seuil 出版，此處採 Charles Lam Markmann 的英譯本。

⁶⁰ 「國語家庭」是自 1937 年皇民化開始後表揚只說日語的家庭的辦法。小說沒有特別描寫義明對皇民化的反應。義明既沒有取日本名字，也沒有當志願兵，至於他只說日語以及拜神社，則可能在皇民化前即已發生。一方面，他從小受日本教育，而養母因參加總督府的產婆講習班學會流利的日語，對他也有影響；另一方面，日化東部與日本移民村的成立，讓神社較早興建。小說描寫愈來愈多臺灣人到神社舉行日本式婚禮，再去義明的寫真館拍照，應已是皇民化時期，其他對皇民化時期的指涉，則是退休警察提到高砂義勇軍，以及琴子遇到種樹的男人提到戰爭期間參加神風特攻隊的臺灣青年。但我對於當時臺灣人能否加入神風特攻隊存疑，《風前塵埃》中有一些事實上的錯誤，例如義明拍照準備參加總督府慶祝始政四十年博覽會的展覽，回家赫然發現避難的月姬，但前者大約在 1935 年，後者則在 1944 到 1945 之間。

同化與皇民化亦需要區分。荊子馨指出，同化與皇民化都是殖民意識形態，但同化「代表了殖民計畫的一般場域，在其中並沒有一致的哲學或系統性的政策」，它一面厲行政治與經濟不平等，一面高喊文化融合，「既讓日本統治維繫一定程度的正當性，同時也留給被殖民者論爭與重新表述的空間」；皇民化則「藉著隱藏與抹去同化的內在衝突，而根本轉化並限定了殖民主體性與認同可以被容許的表述與再現方式」。見荊子馨著，鄭立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頁 131、146。

⁶¹ 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163。

⁶² 同前引，頁 175。

書令他對自己「受過徹底的日文教育感到欣慰與驕傲」。⁶³ 在深層意識裡，他鄙視臺灣和臺灣文化，想成為日本人，而與日本女子婚配是通向此的渠道。

耐人尋味的是，早先，在范姜義明與馬耀谷木的談話中，出現有關同化與現代化的討論。馬耀谷木對日本殖民現代性以及同化政策多所批評，雖然這極可能是他做為日本間諜的偽裝，但這些批評一方面指涉了日本知識界對於自治與同化兩種統治政策的討論，以及二零年代臺灣人的文化與社會運動；另一方面則映照出范姜義明身為臺灣人對日本統治的曖昧矛盾，他的「二我」。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主張對臺灣採取類似同化政策，但新渡戶稻造 (1862-1933) 則傾向於自治，希望保有殖民地人民與社會的獨立性。⁶⁴ 但陳培豐指出，即使支持同化政策的日本論者也沒有一致的看法，例如自由民權運動者板垣退助 (1837-1919) 成立「同化會」，主張立即平等，因此抗日運動家林獻堂、蔡培火都加入，但統治者實際執行時卻強調差別待遇。⁶⁵ 荊子馨認為，二零年代殖民政府之所以改採同化政策，乃是為了因應、控制臺灣菁英日益高漲的自治自主以及臺灣認同的訴求。⁶⁶ 為了刺探范姜義明，馬耀谷木批評日本政府把臺灣推向現代化的意圖，直指資本主義進入日本後的種種遺害，並說他看不慣在本島的內地人（筆者按：即日本人）「自以為高臺灣人一等的那種優越感」。⁶⁷ 他提到板垣退助主張人人平等，但他不贊同板垣認為「臺灣人應同化為日本人」的觀點，而是認為「應該讓本島人，包括山上的蕃人，做他們自己，但不可把他們隔離起來」。⁶⁸ 這接近於主張對臺灣應採自治政策。然而做為一位耽美、日本化的攝影師，范姜義明並沒有回應馬耀谷木對資本主義現代性和同化的批判以及對自治的暗示，而獨獨對他說臺灣人不應當二等公民，感動得眼睛泛淚。這顯示身在後山的范姜義明對日本文化和現代化幾乎全盤接受，對當時臺灣人的社會與文化運動不甚瞭解。

但范姜義明畢竟沒有取日本名字，他也並非無視於日本的父權文化以及對殖民地人民的差別待遇。他不滿馬耀谷木對阿美族女子始亂終棄，恨自己太懦弱沒有替她討回公道。為了參加總督府慶祝始政四十年博覽會的展覽，他在花東縱谷拍攝阿

⁶³ 同前引，頁 158。

⁶⁴ 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 (1909-1945) ——以官營移民為中心》，頁 27。

⁶⁵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2006），頁 33。

⁶⁶ 荊子馨著，鄭立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頁 145。

⁶⁷ 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173。

⁶⁸ 同前引。

美族人的照片，過程中阿美族人不斷抱怨殖民者的剝削。他原想捕捉阿美族人在表面的天真樂觀下「隱微的生命的深沉層次」，⁶⁹ 卻未成功。受到當時浪漫化的攝影手法影響，他拍出來的依舊是「簡單化的觀覺」。⁷⁰ 他自嘆只拍出「他自己幻想中的族群」，⁷¹ 與日本商會拍出的所謂「人類學加上觀光旅遊」⁷² 獵奇式照片並無二致。

總結來說，《風前塵埃》的對位式書寫透過跨種族婚戀呈現國族、性別、族群關係的交纏以及不同社群觀點的重疊與交錯。橫山新藏對跨種族婚戀銘刻了日本男性統治者為征服者、臺灣原住民女性為被征服者的殖民主義父權思想，他與太魯閣頭目之女結婚因此只是遵循同化政策的政治婚姻。月姬與哈鹿克的愛情則因翻轉了殖民主義父權訓令而雙雙被嚴懲，月姬並因此揹負土著化的標記及難以啟齒的祕密。范姜義明對月姬的單戀則是日本成為優勢文化後對日本的慾望投射，並連結到同化政策下他的自我分裂。不論皇民化期間的范姜義明或戰後的「灣生」月姬都因為日本的差別待遇而陷入自我分裂，然而義明想成為日本人，月姬則把臺灣當家鄉，希望留在臺灣。另一方面，透過琴子的視角重建月姬與哈鹿克情慾關係，似乎難以擺脫琴子做為日本左派知識份子將臺灣原住民浪漫化、異國情調化，但也突顯哈鹿克可能因日本化而自我分裂。

五、結論：歷史視野

臺灣與韓國對昔日殖民母國的遺產態度迥異，尤其在八零年代臺灣開始本土化之後。臺灣著重於日本帶來的現代化和發展，韓國則批判殖民與剝削。究其因，韓國在日本統治前原本是獨立的王國，被日本兼并後引爆激烈的獨立運動，抗日與追求獨立結合。臺灣則在割讓後有短暫的「臺灣民主國」，二零年代意識形態紛紜的文化抗日運動在三零年代陸續遭到大搜捕、被禁或自動解散，而 1945 年日本統治結束後旋即落入國民黨政權。相較於日本統治講究步驟與細膩，直到 1937 年皇民化開始才廢漢文，國民黨在接收後隔年立刻廢除日語，推動北京話，再一年爆發二二八事件，1949 年宣布戒嚴、全面中國化，無疑粗暴許多。因此八零年代以來本

⁶⁹ 同前引，頁 246。

⁷⁰ 同前引。

⁷¹ 同前引。

⁷² 同前引，頁 236。

土派反而是利用日本殖民遺緒來對抗國民黨。面對國民黨的反日和本土派的親日，《風前塵埃》的歷史視野則呈現眾聲喧嘩，將日本殖民主義放在跨國脈絡，且顯示批判與肯定的多重曖昧矛盾，同時也不無藉此反諷戒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意味。

琴子參與由美籍韓裔學者金泳喜策畫的戰爭和服展，瞭解到日本軍國主義將「政治美學化」，在帝國擴張期間藉著美麗的和服宣揚軍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以其日本左派的批判視野，琴子批評日本軍國主義和靖國神社，對於太魯閣族退休警察惋惜沒有趕上高砂義勇軍，她暗自嘲諷高砂義勇軍在南洋叢林忠心耿耿當軍伕的卑屈。⁷³ 但反諷的是，她自己對於哈鹿克的想像，仍被浪漫化和獵奇式的殖民凝視所穿透。而同時，她不明白國民黨戒嚴時期對原住民文化的破壞更大，乃至於原住民需要借助日本人的人類學研究和影像紀錄來瞭解自己的文化。⁷⁴ 而另一方面，金泳喜則在反日和喜愛日本文化之間擺盪。金泳喜立志為參與朝鮮三一獨立運動、被迫害至死的外公寫英文傳記，卻沒有完成，後來轉而學日本茶道，又愛上川端康成，直到再度看外公資料，無法迴避歷史才策畫展覽。金泳喜的日文好到使「身為日本人的我（筆者按：即琴子）羞愧不已」，⁷⁵ 在在顯示金泳喜對日本的愛恨情仇。

相較於反日的韓國知識份子對日本的矛盾情結，臺灣知識份子的日本化則多了一份對現代性的渴望。陳培豐認為，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一直有追求現代化的深層心理，因此「臺灣人的抵殖民運動經常帶有燃燒不完全的色彩，對『同化』統治採取協力或抵抗的分界線就相形曖昧、模糊」。⁷⁶ 他進一步提出他的殖民地史觀：「機巧式的抵抗論」，他認為日治時期臺灣之所以現代化（尤其在教育上）成果豐碩，乃是臺灣人在與「同化」政策周旋之中，以機巧務實的方式抵抗統治者，主動爭取而來的。⁷⁷ 不論是喜歡自轉車和攝影機的范姜義明，參加總督府衛生署

⁷³ 同前引，頁 257。

⁷⁴ 太魯閣族退休警察和年輕文史工作者真正目的是追查一件學術界懸案，日治時期一位「蕃化」的人類學家曾有一次秘密的臺灣之行對太魯閣族做了田野研究，但這份報告迄今失蹤。同前引，頁 27-28。桀驁不馴的太魯閣族文史工作者對於琴子從未聽過這位重要的人類學家還狠狠瞪她一眼。同前引，頁 27。退休警察究竟真的惋惜沒有趕上高砂義勇軍，還是藉此拉關係，以便琴子能出借家族在立霧山駐在所時期的照片翻拍，也值得討論。畢竟琴子是殖民者的後代。

⁷⁵ 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198。

⁷⁶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頁 471。

⁷⁷ 同前引，頁 491、473。李筱峰指出，儘管右翼的自治運動被左翼的階級運動痛批，但地方自治聯盟對於促使日本當局在 1935 年開放一半議員民選，不無影響，而這也是臺灣有史以來第一次地方選舉。見李筱峰，《臺灣史 100 件大事（上）》（臺北：玉山社，1999），頁 160、170。

的產婆講習班學會現代接生技術而升格的范姜平妹，花蓮第一位婦產科醫生黃贊雲，或是被移民村吸引的笛布斯，他們的皇民化都與渴望現代化有關。琴子參加的觀光團臺灣導遊也以一座日本時代蓋的橋為例，強調日本蓋的結構堅固，國民黨拓寬的部分則「偷工減料」，每年颱風橋墩都會吹斷幾根。⁷⁸ 這些透露臺灣人民對日本殖民記憶的懷念，一方面來自於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另一方面來自對日本現代性的折服。但除此之外，范姜義明、黃贊雲、笛布斯都喜愛日本文化，顯示日本對後山的殖民尤其成功。在訪談中，施叔青指出，花蓮是「殖民色彩特別濃厚的後山」。⁷⁹ 琴子在七零年代臺日斷交後首次來臺，驚訝地發現日治時期還活在許多花蓮人的心中。

荊子馨指出，日本殖民政府以粗暴的「理蕃」對待臺灣原住民，乃是因為不同於漢人社會，原住民「山地」大多尚未引入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且原住民社會沒有既存階級關係可資利用。⁸⁰ 對於漢人，殖民政府則透過籠絡地主階級，運用他們的影響力，在 1915 年平定武裝反抗後得到統治的穩定。然而不論原住民或漢人都持續反抗，前者以武裝突襲、盜獵、暗中舉行儀典等方式，後者則透過現代公民社會的社會運動或維繫漢文化。若林正丈認為，地主階級表面上順服，私底下累積經濟力量或投資子女教育，仍具有抵抗的可能性。例如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做為民權運動，就是臺灣旅日留學生與地主階級合作的結果。⁸¹ 他又指出，在日本壟斷式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現代意識形態對地主階級子女發生影響、以及臺灣人意識逐漸生成之際，地主階級分裂了。有的成為新興買辦，有的成為民族主義者。⁸² 《風前塵埃》裡，從小受日語教育的義明是親日的買辦型，但也有模糊的臺灣意識。或許漢人來到東海岸較晚，人數太少，「一直到割臺都未見士紳階層之形成」，⁸³ 乃至與西部臺灣菁英推動的文化抗日有些隔閡。

但《風前塵埃》並非一味地贊成現代化。從抵殖民的角度，范姜平妹不諒解遠

⁷⁸ 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15。

⁷⁹ 陳芳明，〈代後記：與為臺灣立傳的臺灣女兒對談——陳芳明與施叔青〉，收入施叔青，《風前塵埃》，頁 267。

⁸⁰ 荊子馨著，鄭立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與臺灣認同政治》，頁 187。

⁸¹ Masahiro Wakabayashi, "A Perspective on Studies of Taiwanese Political History: Reconsidering the Postwar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in Ping-hui Liao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History, Culture,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5-27.

⁸² 同前引，頁 27。

⁸³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臺北：聯經出版，1998），頁 100。

親在日本財閥經營的糖廠當蔗農、接受經濟剝削。敘述者更將野蠻與文明二分問題化，暴露「理蕃」是以現代性之名對原住民進行土地掠奪、經濟宰制與文化破壞。哈鹿克將領導族人與日本人纏鬥十八年的太魯閣族總頭目哈鹿克·那威視為英雄，並繼續盜獵、當嚮導，笛布斯則回到阿美族部落當巫師，都以自己的方式延續文化習俗，暗中抵抗。另一方面，《風前塵埃》也暗諷國民黨不但延續對原住民的殖民，且變本加厲。國民黨政府將花蓮市的「黑金通」改名「中華路」所具有的宣示中華民國領土意味，炮製了日本政府將「七腳川」更名為「吉野」移民村以及「日化東部」。七零年代漢人工頭對阿美族女子娃郁始亂終棄，也與馬耀谷木對阿美族女子始亂終棄如出一轍。只不過娃郁必須跑去臺北當女工，在被歧視、被拋棄後發了瘋，暗示情況更為嚴重。孫大川在八零年代初訪問卑南族孫德昌校長（孫校長是「失語的一代」，曾因不會說北京話而在國民黨政府遷臺不久被迫黯然退休），他便稱讚日本人在行使權威時仍透露美感，在「民族特色的運動競技」中讓原住民族捕捉尊嚴。⁸⁴ 孫大川因此認為「理蕃」雖然讓「原住民的語彙當中，介入了大量的日語，並占據美感、優越的宰制位置」，⁸⁵ 但「原住民原來的文化、社會符號既未遭到徹底破壞，各族母語因而仍有施展或再生產的舞臺與憑藉，民族的『主體性』並未瓦解」。⁸⁶ 相對而言，國民黨政府的「山地平地化政策」、「推行國語運動」則讓國家權力「對原住民語言、文化的干預，達到最高點」，⁸⁷ 在六零年代晚期，並讓原住民社會被納入資本主義經濟分工體系，造成人口大量外移都市，山地社會空洞化，以及「文化、語言和民族情感的斷層」。⁸⁸ 對於經歷過兩個殖民政權的人如孫校長而言，與其說他是懷念日本統治，不如說他更擔憂戒嚴時期原住民族主體性的瓦解。

如果沒有八零年代以來本土化運動及其促發的對日治時期、日本帝國的研究，九零年代由原住民運動蛻變的原住民文化復振運動，乃至於解嚴以來在後殖民書寫領軍下的歷史記憶書寫熱潮，我們很難想像戰後出生的福佬族施叔青可以寫出《風前塵埃》。東臺灣原住民與漢人顯然有不同的語言文化、社會結構與歷史經驗。《風前塵埃》呈現反日與親日曖昧複雜的多重視角，以及本土文化在吸納殖民文化

⁸⁴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語言、權力和主體性的建構——以臺灣原住民母語問題為例〉，頁 34-37。

⁸⁵ 同前引，頁 36。

⁸⁶ 同前引，頁 37。

⁸⁷ 同前引。

⁸⁸ 同前引，頁 38。

後的含混、交織，讓我們重新檢視臺灣與前殖民母國的關係。同時，它回溯日本帝國與全球殖民主義的關係，並描寫戰後臺灣、日本、韓國對殖民遺緒的複雜態度，將臺灣放在跨國脈絡。此一另類的歷史想像深化了對殖民與被殖民關係的探討，讓我們重新深入思考什麼才構成臺灣的後殖民。不論月姬在戰後日本因「灣生」身分所遭到的歧視，她對臺灣的鄉愁，或是琴子批判日本軍國主義，以及發現重構母親生命經驗之困難，都顯示日本必須重新面對帝國與戰爭記憶。而不管是范姜義明模糊的臺灣意識，或抗日的哈鹿克所指向的原住民自治，放在戰後的脈絡，他們對主體性的追求則都需要一方面批判殖民與剝削，另一方面運用日本殖民遺產。

（責任校對：廖安婷）

引用書目

- 王麗華，〈文學的追求與超越——舞鶴、楊照對談錄〉，《文學臺灣》，8，高雄：1993，頁 116-158。
- 〈太魯閣事件——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citing.hohayan.net.tw/citing_content.asp?id=3018，2013 年 4 月 16 日下載。
- 李筱峰，《臺灣史 100 件大事（上）》，臺北：玉山社，1999。
-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臺北：聯經出版，1998。
- 施叔青，《行過洛津》，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03。
- * _____，《風前塵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08。
- * 南方朔，〈推薦序：透過歷史天使悲傷之眼〉，收入施叔青，《風前塵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08，頁 5-10。
- *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
- * 荊子馨著，鄭立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6。
- 陳玉慧，《海神家族》，臺北：印刻出版，2004。
- 陳芳明，〈代後記：與為臺灣立傳的臺灣女兒對談——陳芳明與施叔青〉，收入施叔青，《風前塵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08，頁 262-277。
- *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2006。
- 張素玠，《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臺北：國史館，2001。
- *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臺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
- Appadurai, Arjun.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Public Culture*, 12.1, 2000, pp. 1-20.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 Ching, Leo T. S.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Cumings, Bruce.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Du Bois, W. E. B. "Of Our Spiritual Strivings,"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Terri Hume Oliver (ed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pp. 9-16.

-
- *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67.
 - Kleeman, Faye Yuan. *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 *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 * Wakabayashi, Masahiro. "A Perspective on Studies of Taiwanese Political History: Reconsidering the Postwar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in Ping-hui Liao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History, Culture,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9-36.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Pei-feng. *Tonghua no Tongchuang Yimeng: Rizhi Shiqi Taiwan de Yuyan Zhengce Jindaihua yu Rentong (The Different Intentions Behind the Semblance of "Douka": The Language Policy, Modernization and Identity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Ruling Period)*, trans. Wang Xing'an and Fugeshi Jumpei.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06.
- Ching, Leo T. S. *Chengwei Ribenren: Zhimindi Taiwan yu Rentong Zhengzhi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trans. Lixuan Zheng.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06.
- Du Bois, W. E. B. "Of Our Spiritual Strivings,"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Terri Hume Oliver (ed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pp. 9-16.
-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67.
- Fujii, Shizue. *Lifan: Riben Zhili Taiwan de Jice (The Enterprise of Governing the Savages: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s Policies Toward Taiwanese Aborigines)*. Taipei: Wenyingtang Books, 1997.
- Nanfang, Shuo. "Tuijian Xu: Touguo Lishi Tianshi Beishang zhi Yan (Introduction: Through the Historical Angel's Sad Eyes)," in Shu-ching Shih, *Feng Qian Chen'ai (Dust Before the Wind)*.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2008, pp. 5-10.
-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 Shih, Shu-ching. *Feng Qian Chen'ai (Dust Before the Wind)*.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2008.
- Sun, Tachuen. *Jiafeng zhong de Zuqun Jiangou: Taiwan Yuanzhuamin de Yuyan Wenhua yu Zhengzhi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ies against the Odds: Taiwanese Aboriginal Languages, Cultures, and Politics)*. Taipei: Unitas Publishing Co., 2000.
- Wakabayashi, Masahiro. "A Perspective on Studies of Taiwanese Political History: Reconsidering the Postwar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in Ping-hui Liao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History, Culture,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9-36.

The Alternativ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Shih Shu-ching's *Dust before the Wind*

Liou, Liang-ya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ical memory fiction has flourished ever since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Taiwan. Some of these fictions excavate multi-ethnic,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s in relation to colonialisms, exploring ethnic experiences beyond stereotypes and debunking monolithic national imagination, thereby opening up possibilities for an alternativ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alternativ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Shih Shu-ching's *Dust before the Wind*,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its representation of issues that had rarely been dealt with before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such as the "enterprise of governing the savages," the Taroko Battle, the ethnic relationships in Hualien under Japanese rule, Japanese immigrant villages, and post-war Japanese legacy. I argue that the novel presents an intricate re-vision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and Taiwan's postcoloniality by contrapuntally portraying three ethnic groups in easter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depicting post-war Japanese legacy, as well as by re-exploring the identity problems triggered by assimilation, imperialization, decolonization, and indigenization.

Key words: *Dust before the Wind*, alternativ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contrapuntal writing,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colonialism, national/ethnic/ gender politics

(收稿日期：2012. 5. 10.；修正稿日期：2012. 9. 10.；通過刊登日期：2012. 11. 21.)

